

◎ 高层人物传记丛书



一生紧随毛泽东

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陈人康 / 策划、口述
金 汕 陈义风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陈人康 / 策划、口述
金 汕 陈义风 / 著

一生紧随毛泽东

——
回忆我的父亲
开国上将陈士榘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继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版式设计:蒲正波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陈人康策
划、口述,金汕、陈义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

ISBN 978-7-01-006105-4

I. 一… II. ①陈… ②金… ③陈… III. 陈士榘(1909 ~
1995)-传记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4640号

一生紧随毛泽东

YISHENG JINSUI MAOZEDONG

——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陈人康 策划、口述 金汕 陈义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351千字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01-006105-4 定价:32.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6

《高层人物传记丛书》已出书书目

《陈云晚年岁月》 28.00元

《毛泽东的翻译
—— 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 38.00元

《在中共高层50年
—— 陆定一传奇人生》 29.50元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戎马生涯》 29.50元

《一生紧随毛泽东
—— 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32.00元

《毛泽东和他的“顾问”》(修订本) 28.00元

《毛泽东称赞的“好人”贺敏学传奇》 38.00元

责任编辑：张继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版式设计：蒲正波
责任校对：湖 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感念万千上笔端

——代《前言》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必讳言的是,生在像我这样的家庭是很令同一时代的人羡慕的。我出生在解放初,当从有记忆的时候起,便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生活。父亲陈士榘是20年代参加革命的,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些让一代中国人肃然起敬、充满着史诗般传奇色彩的事件,父亲都参加了,而且干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人物,也都对父亲的工作做出过很好的评价。不管我承认不承认,也不管我是否意识到,我的一家在一段时间内生活在“上流社会”。对于父亲的业绩,我们是爱戴甚至是崇拜的,父亲同许多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一样,为了民族的独立和昌盛,忘我而英勇地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尤其父亲指挥战争的才华很受同辈战友的赞赏。

但是,作为子女,我们又特别看重他在家庭中的位置,我们特别惋惜父亲没有处理好同母亲的关系,也使我们子女在很长时间内生活在他们“冷战”阴云中。他们在晚年离异,后来几乎不再来往,只是1995年父亲去世,母亲怀着复杂的感情赶到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见到叱咤风云的父亲僵硬地躺在那里,回首曾经与父亲度过的艰难与幸福的岁月,不禁泪如雨下,多少年的恩怨在此刻才突然消逝了。人走上黄泉路,生者对死者也格外宽容。

作为子女,没有资格也无法准确地评价他们的关系,但子女却可以如实地回忆,给后来人一点启示,以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这位开国



上将的不凡与局限。

父亲1927年入党，同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40多年后，正是老干部纷纷被打倒、人人自危的时刻，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军队干部，谈八大军区司令调动，父亲当时是中央军委常委，但也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天被打倒。毛主席见到父亲，伸出大手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这句话无疑使父亲的处境得到很大改观。即使这样，一心崇尚“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父亲也没敢替关在狱中的母亲说一句话——尽管母亲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在延安的丑闻。

父亲所以一辈子紧跟毛泽东，是他在井冈山时起就感到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实在了不得。父亲记得主席在谈到为什么上井冈山时，从一个人根本意想不到的角度来论证：主席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没能把土匪问题解决得了，中国经济落后，交通通讯不发达，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也上山去当“大王”。在场的一些同志想，国民党本来就骂我们是土匪，我们何必“拣”这个骂呢？毛主席笑着说：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也不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我们要消灭的是人吃人的剥削制度。

毛泽东后来还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的大转变。”他还告诉大家：“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孔阳绰号），和官兵打了多年交道，总结的‘打圈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圈’是消极的。我们工农革命军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原则。”

毛泽东一席话，父亲记了一辈子，他感觉毛主席如神一般，那时井冈山才几个人啊，谁会想到从这座山出来的部队会搅得天翻地覆，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格局啊？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细化到每一件小事和细节，他多次对我们说起：“毛主席是中国无人可比的战略家，可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主席从来不带枪。我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砦市红四军

成立大会上。这天，毛主席特别高兴，他挎上匣子枪，走到行伍出身、经常一身戎装的朱老总跟前诙谐地说“背上盒子枪，师长见军长啰”。不过，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

当然，后来父亲和毛泽东关于枪的“交易”还有一次，那是他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在一次战斗中，父亲缴获了一支类似现在“掌中宝”的微型手枪。父亲爱不释手，但是感到还是送给他的上司林彪更好。林彪看到后喜出望外，把玩一阵后说，还是送给毛主席。毛泽东拿到枪后看了一看，放在一旁，无所谓地说：“待到我用上它的时候，红军早就完了。”

父亲解放后对我们念叨最多也最让他得意的是，1927年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父亲作为士兵代表被选为三个常委之一。毛泽东笑着对父亲说：“陈士集，你做了县太爷了，你也是个山大王哩。”

父亲还多次回忆起长征中他险些为中国革命闯下的大祸：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毛泽东让父亲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父亲用聂荣臻的望远镜观察好地形，主席半开玩笑半是安排任务地叫父亲“设营司令”。有一天父亲为中央机关带路，用半天时间翻山越岭，却突然发现前面是一条在黄土高坡上被洪水冲击的深深的沟，根本不能过人。父亲急得满脸通红，六神无主，毛泽东连一句责备父亲的话都没有，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向后做了个手势，扭头就走。父亲为这件事后怕了一辈子，他说当时若碰上敌情，前无出路，后无部队，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但主席第二天对父亲说：“昨天那程子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

1938年3月17日，父亲率部队在晋西与日寇奋战，他当时是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兼晋西游击支队队长。战斗非常激烈，父亲奋不顾身地指挥，突然，日军一发炮弹在父亲的左侧爆炸，他被掀进一个壕沟里，顿时失去了知觉。直到醒来，他才知道自己活着，因为炮弹爆炸的瞬间他认为自己将捐躯给心爱的祖国。

他全身上下九处负伤，整个左侧没有几处好的地方，由于伤势较重，贺龙指示医务人员将父亲尽快转到延安医院治疗，于是他住进了延安军队医院。住进医院，父亲非常焦急和烦躁，他感到战事太紧，



就这样躺在医院里实在无聊。

一天，一个骑马穿着军装的女干部来到医院，看气派绝不是那种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女子。这个女干部非常白净，说话也细声细气。她说：“毛主席让来看望你和王耀南同志，还有一封信。”信封上是道劲有力的毛体字，信中有200元钱，还有鼓励父亲尽快养伤重上前线的话。

父亲的眼眶顿时湿润了。他打量了一下这位女同志，看到院子里那匹自己很熟悉的毛泽东一直在骑的马，断定眼前的这个女干部就是江青，因为在当时许多八路军将领都知道毛泽东和一位上海来的女演员结了婚。父亲对这个女干部说：“谢谢主席的问候与关心，您告诉主席，我会尽快养伤，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父亲后来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只是转战南北，不知哪一天会去见马克思，就把信交给一位负责宣传的同志保存，解放后父亲向这位同志要这封信，可惜信已经丢失了。父亲为此后悔了几十年。

我曾对父亲说：“主席如果在晚年也能这么宽宏地对待同志，不搞‘文化大革命’，那该多好……”。父亲到了晚年虽然终于承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也有他独特的看法。有一次谈起一个“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父亲说：“‘文革’中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也值得同情，可是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镇压胡风集团、反右扩大化、庐山会议……每一次都是他打头阵，但是我们公开的报道都是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整人，这就会以偏概全。还有一位威信很高的军队领导，他的确很了不起，可是解放初期，他也整过刘帅。所以，你们年轻人应该更全面地看待主席。”

我有时与父亲辩论：“不管怎么说，就像党中央做出的决议，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确犯了严重错误。那么多年我们国家就知道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毛主席的责任是最大的！”

遇到这样的诘问，父亲教诲般地对我说：“再怎么，毛主席的功远远大于过，他让我们的国家彻底地独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带着我们研发了核武器，遏制了帝国主义的讹诈，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国家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父亲的确有一种朴素的为国为民奋斗的理想，也同时有同样朴

素的“忠君”思想。他总是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主席对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记一辈子，直到80多岁，甚至弥留之际。

父亲故去后，我一直在追寻着父亲的足迹，先后找了六七位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干部和秘书交谈。这时，父亲的职位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威慑作用，也许在他离开世界之后，也才能更有其真实性。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陈司令不爱整人，他保护了不少知识分子。”“‘文革’中，他的部队到地方‘三支两军’，一些造反派冲击军队，支左的部队及司令部里要求开枪还击的呼声很强烈。陈司令坚决不同意，还说‘对群众不能用枪，那样做将是千古罪人’，但是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想不通，陈司令用军人的口吻命令，‘我们坚决执行最近总理对军队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不少像父亲这样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都在心目中把毛主席视为神。主席为推翻三座大山运筹帷幄，这些将领也出生入死、冲锋陷阵。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打倒走资派，他们也睁大眼睛寻找阶级敌人，即使不理解也迫使自己理解和执行，即便有一天轮到自己被打倒，他们也无怨无悔。

近年来，我们一些50年代高级将领的子女谈起往昔，都感到父辈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精神品质与人格力量，光他们为一个理想忍辱负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无怨无悔就够我们学的。但从传统到现代也隔着一道鸿沟。有一位同是上将的儿子对我说：

“你的父亲毕竟上过几年私塾，会写点东西，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可他却领导着一个兵种。‘文革’中他们被打倒是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尽力而为……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很足，但搞现代化真是勉为其难。”

但这毕竟是我们共和国的一段历史。

父亲转战南北，直到30多岁还没有结婚。残酷的战争使很多将领顾不得个人的婚姻，连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也是40多岁才结婚。从中也可以看到那一代革命者对事业的执著与忘我。

父亲任115师参谋长时，师政委是罗荣桓。罗政委关心父亲的婚事，劝他：30多岁的人也该考虑个人婚事了。母亲当时才16岁，她是在山东日照参加革命的。我的外祖父也是老党员，当时任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任书记。母亲先在115师文工团，后在山东省军区机



关电台工作，与父亲接触多了，父亲觉得这个小姑娘很讨人喜欢，对她产生了好感。父亲曾想给她写封信，但有顾虑，觉得如果“谈”不成，对面子上不大好看，自己毕竟是“首长”。一位干事发现了深藏在父亲心底的秘密，便主动牵线搭桥，把母亲的心说动了。当年，像父亲这样级别的干部寻找配偶也要“政审”。父亲的上级罗荣桓找母亲谈话，问母亲家里有几个人，都做什么工作。罗政委对母亲的家庭情况很满意。罗政委从撮合父母恋爱再到结婚，父母一共只“谈”了两次，真是闪电战的速度。

战争年代，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共同的理想、艰苦卓绝的环境，让他们相濡以沫。母亲后来回忆起这些仍很怀念，她说苦虽然苦，但心里是充实的，心灵也是纯洁的。结婚第二年，母亲生了个女孩，不几天孩子就死了，当掩埋我的苦命的姐姐时，母亲泣不成声。刚强的父亲用独特的方式安慰母亲：“这就是革命啊，我们的同志每天都有牺牲的……”。说这话的时候，父亲深情地久久凝视着埋葬姐姐的地方。

父亲是个职业军事家，他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打好仗、少伤亡、多歼敌上。他的战功是显赫的：歼灭日本1000余名精锐侵略军的平型关大捷，父亲时任旅参谋长（115师一共两个旅），这是我军历史上彪炳千秋的战役。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凶残的日本兵无恶不作，他们遇到被俘的绝境宁可自杀也不肯被活捉，而父亲亲手活捉了侵华日军的第一个俘虏兵。在解放战争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父亲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役处于相持阶段，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电召父亲，任命他为围歼黄维兵团的南集团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父亲率领的八兵团最先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我们从电影资料中看到的拉下青天白日旗的解放军战士，就是父亲的兵团战士，父亲也成了解放后第一任南京警备区司令。邓小平政委曾在解放战争中对父亲说：“陈毅和粟裕都讲过你，说你的点子好厉害呀，华东的几个大仗都是你最早提出来的，是不是呀？这次你可要为我们也提出一些点子呀，解放军可是一家人呢！”……

在我们的记忆中，无论在南京，还是父亲调到北京当第一任工程兵司令的时候，我们家属都是备受呵护。一切时光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当然，那时的所谓特权在今天看来也无非是吃得好点，但

没有一点奢侈。父亲当司令这么多年，只带我们全家去青岛避过一次暑，当时是住在一座俭朴的军营里。当时，还令同龄人羡慕的是，我曾坐着父亲的吉普车去东北，趁他到辽宁视察雷锋班时兜兜风。与今天对比起来，那还真是苦差事。由于雷锋是工程兵，父亲为自己的兵种出现一位被毛主席表扬的战士而深感荣幸，他不辞辛苦地颠簸而去，当时我都感到很累，上了年纪的父亲更是可想而知。

父亲每到基层，总是对地方首长说，到下面看看。看到几乎所有的军人见到父亲都对他敬军礼，都毕恭毕敬，我对他就更崇拜了。他真是职业军人，对我们也总是一脸严肃，很少开玩笑，一副上级对待下级的样子。一次，我与父亲谈起儿女情长的话题，父亲说，我们跟随主席出生入死闹革命，哪还有什么儿女情长啊！？之后哈哈大笑，笑得我很难为情。他曾亲口对我们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其次才是你们的父亲。”就跟《音乐之声》电影中的那位海军上校一样，只不过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版。

如今回忆起来，父亲在居高官后对母亲关心照顾得也不太周到。父亲带有军人粗线条作风，对打大仗、建大基地有着丝毫不懈怠的职业习惯。他是个工作狂。我们六兄妹生活、上学的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

我们谅解父亲，他的工作太繁忙了。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他工作繁忙的程度：父亲1930年在中央苏区拔掉过一颗牙。8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批下给父亲镶牙的金子，但父亲却没有时间去镶牙。频繁的战事让他一拖又是8年。直到1946年秋父亲赴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让邓颖超找了个当地的名医为父亲镶牙，父亲才镶上这颗耽搁了16年的牙。

解放后，父亲常常突然“失踪”，好多天不着家。1958年一个夏季炎热的中午，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父亲，让他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有重要指示。父亲马上赶去，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等坐在游泳池旁的一个棚子里，老人家穿着游泳裤，身披白色浴衣，比常人大许多的肚皮裸露着。他对父亲说：“是我请你来的，正好有事跟你商量，郑州黄河铁路桥被洪峰冲垮，你们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桥啊？”周总理也说：“工程兵在黄河架过桥了。”此后，父亲从我们家里失踪了。原来，他星夜赶往黄河，一待就是几十天。



也是在那年夏天,彭总代表中央召见黄克诚、张爱萍和父亲,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中央决定成立特种兵工程指挥部,代号7169部队,也是当时共和国最为绝密的部队。中央决定工程兵做窝,国防科委下蛋,中国导弹实验靶场第一期工程一定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于是,父亲又失踪了,他率十万工程兵大军,在保密状态下开到西北大沙漠,在这个“死亡之海”进行“两弹”工程建设。

父亲长时间在戈壁滩奔波,与战士们一样饱尝了火炉般的炎热与干燥。他为了视察和探明这个神秘的荒漠,向空军司令刘亚楼要了一架飞机,到沙漠上空也到天山峡谷。由于不是航线,在峡谷中遇到过四面黑糊糊只见一线山垭口的险情。飞机差一点撞在山上。父亲带着几个工程技术人员走进沙漠的深处,那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看到了一架看样子还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的小型飞机,由于汽油不够停在沙漠。奇怪的是飞机里没有人,他们又走出几十里,看到了7具木乃伊。原来是从飞机里下来的7个国民党军人,终于没有走出沙漠,尸体已经风化了。

父亲的下属还搜了搜木乃伊的身,发现他们身上有黄金和烟土,父亲即兴地说:“国民党怎么能不败呢?打仗还想着发财,想着享受。我们虽然夺取了政权,可还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工作,不为待遇,不享清福,我们吃苦,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长治久安。”

父亲身在高位,就是这样无怨无悔地努力 working。当时参加援华勘察的苏军上校问我方人员父亲的军阶,当知道他竟是上将时,表示出由衷的钦佩与惊讶。我们经常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见不到繁忙至极的父亲。我们理解父亲对我们关心不够是由于他总是在为国为民,但我们也羡慕有很多与父亲一样的高级干部对孩子总是非常关切。父亲与母亲分手,固然是“文革”起了决定作用,但与父亲身居高位、工作太忙、缺少情趣、不善沟通也不无关系。

父亲毕竟是个农民出身的将军,文化素质与现代化观念都受到时代的限制……。当然,父母离异,母亲的责任也同样大,她不太理解父亲,遇到一些容易产生矛盾的事情不仅不能主动与父亲去沟通,反而总是火上浇油。我们还有个共同的感觉,父亲毕竟比较大气,而母亲身上的农民意识却比较重,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们的婚姻不可能

延续。

父母离异，还源于工程兵的一场权力斗争。一位领导一直觊觎着父亲的位子，当时要打倒父亲的大字报也不少，而如日中天的林彪与父亲关系一般，因为父亲历来遵循的原则是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而不与其他首长有过多的私人交往。所以父亲绝对不像黄永胜、吴法宪那样得到宠信。父亲又不是第四野战军的人，所以一度也岌岌可危，如果家里再有个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离倒台也就更近了。

母亲是个直筒子脾气，加之是司令员的夫人，平常说些过火话别人也不敢说什么。但政治上并不成熟的母亲恰恰忘了，那是个非常岁月，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有过一句曾被全党接受的话：中南海里除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反对，都可以炮轰。这也为整人的人壮了胆儿。

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母亲讲过在延安江青追毛主席，讲她神经不大正常。材料递到江青手里，她当然怒不可遏，因为老革命知根知底，必须封住这些人的嘴。她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母亲。

这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父亲应该了解母亲，至少在心里应该同情母亲，但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使他对母亲说的话很不中听。父亲认为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不能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其实，凭主席对父亲有着较好的印象（在“文革”中父亲始终未被打倒过），他至少可以做些努力。“文革”中，毛主席让父亲当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毛主席当着总理、叶帅对父亲说：“陈士榘，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主席作为大政治家军事家和领袖，对干部的评价是很慎重的，他很少当面夸谁的仗打得好。主席的这番话对父亲来说是少有的殊荣。父亲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同时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离婚手续始终没办。

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有时刑讯逼供，几天几夜不让她入睡，有时用饥饿折磨她。起初仅仅是给她戴手铐，后来用了脚镣，从10斤长到20斤再到30斤。母亲不仅身体坏了，神



经也受到很大刺激。身上的病态至今也常常显露出来。

前几年，风烛残年的父亲得知当年策划对他和母亲实施这一迫害的老同志已不久于人世，去医院探望了他，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老同志对自己的行为造成陈家妻离子散表示歉意：“我对不起你！”父亲说，咱们都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不要再想不愉快的事了。这位老同志流下了泪水。

母亲出狱后问题并没有解决，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父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也还不能团圆。而母亲在狱中的几年时间里，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并不鲜见，“文革”结束时这类事还是个搞创作的热门题材。但当某个家庭真正遭遇这种事时，受害的家人却是很痛苦的。

父亲有地位，人高马大，很有军人的英武气，难免有些女性会对他有好感。出狱后获得自由的母亲对父亲移情别恋很生气，这更加剧了他们感情的裂痕，如果母亲理智些，是可以妥善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但在狱中受到强烈刺激的她已不懂得什么克制了，她还向有关部门，而且不止一个部门写信揭发父亲，这使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

父亲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高于一切。然而时代的进程又对革命有了全新的解释。父亲至死仍认为只有毛主席的学说才是最正统的革命思想。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他可以赴汤蹈火，可以大义灭亲。对所谓“反革命罪行”的母亲，他大义灭亲，对子女他同样大义灭亲。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倒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江青、康生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当时，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所谓“人民的敌人”而忧心如焚。

因为贴标语，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他们得知父亲仍然是一个兵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可以放了我。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他们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

我被送回公安部，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后回家的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这是到哪里去了？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做的事做了批示。”1968年，江青有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单行本就印了几千万册。其中有这样一段：她问父亲，“陈士榘，你把儿子管起来没有？”父亲回答管起来了。这段话使我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反面明星，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但我不到17岁时，又当上那个时代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解放军，上世纪70年代被送到南开大学读书，这终究还是父亲的面子吧！

由此可见，“文革”中，我们的命运固然值得同情，但真正应该同情的是那些无依无靠，仅仅因为出身而被侮辱为“狗崽子”的青少年，是那些像动物一样被红卫兵推来搡去、剃头殴打的所谓“黑五类”，是那些一夜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就被赶到乡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资”，是那些被打死或自杀横尸街头的冤魂。他们受的迫害与屈辱才是深重的。

父亲与任何首长都没有较深的关系，他就崇拜毛泽东。毛泽东做得正确他就跟着正确，毛泽东犯错误他也就跟着错。

“文革”中，林彪曾单独找过他，同他谈三北国防工程建设的问题，谈过后又叮嘱他：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就不要对其他领导谈了。父亲一想，毛主席是军委主席，怎么能不让主席知道，他通过总参向主席反映了此事，还向三位老师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做了汇报。

父亲所以不犯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就是他认准了只听毛主席的。父亲后来也对我说，林彪其实是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家，如果不是“文革”中他积极参与打倒很多人，不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膨胀了野心，他怎么也是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大功的人。

父亲还透露，林彪并非一贯整人，早在1964年，我的大哥因为自小向往伏龙芝军事学院，幻想到苏联留学，便独自一人来到满洲里，后被拘留。事情闹到总参，当时总参领导认为哥哥是为父亲出逃苏联打前站，这当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推断，况且父亲也根本不可能这



样背叛他心中的神灵毛泽东，但也由此可见，“文革”前的株连和当时“阶级斗争”已经相当严酷了。

事情上报到中央军委，林彪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席没有忙于下结论而是做了调查，最后做了对父亲“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的批示，也算没有让父亲蒙受冤屈。即使有这样的感恩之情，父亲还是与林彪保持着距离。

父亲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所以，搞“文化大革命”时，毛主席要批判的人，他也一定去批判。为此他也无可避免地犯了政治错误。1977年他受过审查，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却也毕竟不同于自始至终受“文革”残酷迫害的老革命。其实，按照当时党内老干部的思想状况，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

父亲与母亲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试图破镜重圆，因为毕竟年事已高，6个孩子也希望保持一个完整的家。但母亲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便发泄和絮叨一下，父亲作为军人又有着刚烈的性格，绝不迁就，短暂的聚会终于导致了彻底离异。

父亲离开职务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我看到那时的父亲心里总有些辛酸，这个经历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军人变得像一座百无聊赖的雕像。他本来是那么威武魁伟，指挥千军万马是那样得心应手，他从十几岁参加革命到退下来之前永远有干不完的工作，可是退下来后却终日无所事事。

有时候我们和父亲侃侃，想让他高兴，我对他说：“我想在以后帮您写一本传记。”父亲似乎不大相信地说：“你能写？写出来人家会说你替老子树碑立传，要写就写一个真实的我，如果你非要写，还是等我死了以后吧！”他多次说起过，我打了一辈子仗，政治家算不上，军事家总可以吧。遗憾的是共和国的军事家似乎没有他的份，如果真正比较一下战场的业绩，他应该是完全够格的。这位被毛泽东称为风头出尽的将领，至死感到这对他是不公平的，他是带着一丝遗憾离开世界的。

也就是从父亲默许我为他写传记那一天起，他真的和我聊起他的一生的经历，也只有回忆起那风风火火干工作的岁月，他才会忘记烦恼和寂寞。那一段时间使我全方位地了解了，也让我坚信，有朝